

第 8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 八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厚安
责任校对：郑厚安
封面设计：王彦平
版式设计：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ówài Zhōngguó Jīndàishǐ Yánjiū
第八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兵部书局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90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1190·162 定价：2.35元

限 国内发行

目 录

-
-
- 1 兴中会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意义……………松本武彦
周泮池译 白子明校
- 22 回忆秋瑾女士……………服部繁子
郑云山译 李廷善校
- 41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
进步理论……………Л.Н.鲍罗赫
吴根梁译 董进泉校
- 61 李大钊的思想演变过程……………B. A.克里夫佐夫
B. A.克拉斯诺娃
郑厚安 刘佐汉译
- 118 华莱士使华前后……………罗伯特·菲斯
林海译
- 158 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新探……………史蒂文 I. 莱文
肖健宁译 王应一校
- 188 四十年代末期美国对华外交策略……………A.马鲁欣
丁如筠译 郑厚安校
- 203 耶稣会士在中国……………A.布鲁
顾裕禄译
- 215 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
的孔教复兴运动……………颜清湟
粟明鲜译 马宁校
- 247 马来西亚华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李国卿
柳平译

282	在印垄断与在华开放（1830—1933年）·····	黄宇和 区拱译
302	苏联与新疆省的贸易（1913—1926年）···	奥·布克施泰因 吴永清译 林荫成校
321	关于日本纺织业打入中国·····	杨天溢 唐宝林译 宓汝成校
342	奉天军阀的经济基础、经济特征 及其崩溃的过程·····	小林英夫 熊达云译
356	读者来信·····	

兴中会在孙中山革命 活动中的意义

——着重与华侨相关的问题

松本武彦

一 前言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家，综观他的年谱，在笔者看来，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革命运动的筹划，大多是在国外进行的。从1895年到1911年先后发动的十次起义中，孙中山在国内直接领导的只有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而三民主义的原型，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追述的那样，是在伦敦被清政府公使馆监禁以后，通过对欧洲的考察和研究而形成的^①。

如果可以把古今堪称革命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概括为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从而试图推翻它；或进一步讲，这一行动是由于对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的处境与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引起的话，那么，孙中山又是如何认识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民众状况的呢？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终身奋斗目标是变革中国的现实，而他的活动却主要是在国外进行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满清王朝被推翻后，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虽时日短暂，但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这件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可以说，这正是他在对中国民众生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付诸革命实践的。那么，他身居国外，究竟是怎样了解中国民众生活的呢？

^① 见《孙中山选集》1956年版，第171—172页；《国父全集》1973年版，第1册，第494页。

拙稿之所以把副标题写为“着重与华侨^①相关的问题”，其理由就在于针对上述疑问，试从广义上提出笔者的见解。具体地说，孙中山对中国民众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讲，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集中地承受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重压而流亡国外的中国人，即与华侨的接触而来的。或者至少可以考虑华侨的存在是他认识民众的一个重要途径。依据这条线索来探讨近代中国的华侨问题，做为必须弄清的一个重要课题——辛亥革命与华侨的关系问题，便展现在我们面前。

关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华侨的关系，已有不少论述^②。从这些论述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大致可归纳如下：第一是华侨对辛亥革命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以什么方式为革命做出贡献。铃江言一氏的文章，在强调华侨是革命运动资金的赞助者的同时，还列举了华侨在直接参加起义和对革命思想的宣传、普及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二个问题是，华侨为什么参加革命运动。关于这个问题，黄福鑫在阐述华侨出国的原因和当时清政府对华侨的态度的同时，把华侨参加革命运动的理由视为：华侨期望中国出现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政府，能够使自己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第三个问题是，在华侨当中，究竟有哪些人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

① 本稿用了“华侨”一词，但深究“侨”的字义，本该用“华人”为宜。但是，王赓武在《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史》（载崔贵强、古鸿廷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1978年，第27—32页）中所述的“华侨”一词，特别强调革命运动高潮中“侨”的意思，考虑到具有在中国本土与海外中国人坚强团结的意思，在此用“华侨”一词，从本稿内容来看是比较妥当的。

② 见铃江言一：《孙文传》，1921年，第4节第2项；成田节男：《增补华侨史》，1943年，总论第9章；黄福鑫：《华侨与中国革命》，1954年版；菊池贵晴：《华侨与革命事业的变迁》，载《历史教育》四——二，1956年2月；Wang Gung 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载《东洋学报》一五——二，1959年12月；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1963年；北山康夫：《辛亥革命与华侨》，载桑原武夫编：《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1964年；市川健二郎：《陈嘉庚与华侨的政治捐款》，载《东洋学报》五一——二，1966年9月；永积昭：《中华民国成立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动态》，载河部利夫编：《论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1972年；内田直作：《东洋经济史研究》II，1976年，第10章第9节；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r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1976；孙健：《华侨与辛亥革命》，载《历史研究》1978年——四。

。孙健氏在论文中把华侨划分为工人、中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三个部分。他认为，工人是革命最坚强的支持者，大资本家对革命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第四个问题是，保皇派和革命派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而形成的对立形势。对此，菊池贵晴做了明确阐述，他与第三个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保皇派与华侨资本家阶层结合紧密，而对下层华侨却表示了冷漠、疏远的态度。与此相反，革命派是全力争取包括工人在内的华侨大众的支持的。

在阐述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个问题时，笔者认为，把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具体说来，是在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去考察华侨的作用呢，还是相反，从华侨本身的自发活动中去了解革命运动。笔者认为应从后者的立场去探求，才能对这个问题找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必须弄清楚的是，并非革命派把华侨作为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力量去对他们进行组织工作的，而是世界各地的华侨出于自己的某一种想法，采取某一种形式去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的。革命思想的普及与传播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理论上的完美无缺，而是决定于这种理论是否能够鼓舞人心。孙中山等革命派想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就必须使自己的活动与各地华侨社会的实际状况相适应。因此，笔者冒昧地认为，革命运动的开展，在许多方面是受生活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华侨社会状况所制约的。

基于上述立场，笔者试将阐明日本，特别是横滨华侨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活动，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拙稿的标题和副标题的全部含义，目的就在于揭示兴中会时期，旅居横滨的华侨对革命所持的态度。为此，不仅要从小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而且要尽量从华侨本身加以探讨。换言之，就是从华侨对待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来阐明兴中会时期横滨华侨的活动。

此外，关于本文的结构。为了说明兴中会时期横滨华侨社会的状况，可以提供的一条线索是当时华侨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那么，在这一时期横滨的华侨社会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分

化。假如存在，必须进一步弄明白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关于当时旅居横滨的华侨社会中这种阶层的分化问题，笔者将留待后叙。为此，首先要阐明的是有关横滨华侨的沿革，进而着重讲一下以华侨中下层劳动者为核心成立的社团中和堂，并通过这个社团与横滨兴中会的关系来探讨华侨对革命运动所持的态度。

二 横滨华侨沿革

1859年（安政六年）6月神奈川港口的开放，是横滨华侨社会形成的开始。开港之初在那里的中国人的数目已经不详。可是不难想象，随着欧美商行的设立，有些人业已充当了买办的零工。有人估计，当时中国人大约有40至50人^①。另外，他们在当地因属无条约关系国民，所以来往、居住都比较自由^②。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无条约关系的国民，都应遵守日本当局的法律。据1867年（庆应三年）11月颁布的《横滨外国人侨居地管理规则》第四条规定，无条约关系侨民一律进行登记^③，并在民事、刑事上受神奈川知县的管辖。按照规定，在登记时划分为上等（买办、商人）、中等（佣人、手工业者）、下等（劳工）三个阶层，依此对他们分别征收15美元、7美元、3.5美元的户籍税^④。在同一年出现了中国人建立自己组织的端倪，侨居横滨的华人张灏堂、陈玉池等数人，为组建中华会议所向幕府提出了申请^⑤。这是侨居横滨华人的互助组织以及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的机构^⑥。有关明治初年横滨华侨的职业、阶级分化状态，史料阙如。仅据前述侨居地管理规则，从明治二年到明治三年，登记在册的中国人，有上等36人、中等63人，下等903人，共计1002人^⑦，1871

① 见《横滨市史稿》产业编，1932年，第8页。

② 见《横滨市史》，第3卷下，1963年，第860页。

③ 见《横滨市史》，第3卷上，1962年，第367、373页。

④ 同上，第373页。

⑤ 见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1949年，第319页。

⑥ 同上，第165页。

⑦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62页。

年（明治四年）7月签订了日中复交条约，1873年（明治六年）3月批准生效。在这中间，1872年（明治五年）7月，发生了停泊在横滨的秘鲁轮船“玛利亚-露丝”号中国劳工逃亡、向神奈川县要求庇护的事件，即所谓的玛利亚-露丝号事件^①。在日中复交的前两年（即1871年），中华会议所已改名为中华会馆，同时会馆建筑物落成^②，且确定了中国公墓的地界（中华义庄）^③。1874年（明治七年）4月，制定了《旅日华人户籍条例》。当时虽然缔结并批准了《日中复交条约》，但鉴于中国驻日公使、领事缺任，条约未能生效。于是日本方面重新制定了一个处理华人事务的统一条例，规定上等人须纳户籍税2日元、下等人缴纳10分钱^④。那么，在旅日华人的生活稍微稳定之后，正式构成为一个华侨社会始于何时呢？笔者认为大约是从1874年左右开始的。上一年（即1873年）做为自治机构核心的中华会馆落成，并确定了墓地，而且所谓的“唐人街”（南京街）也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⑤。

根据前述条约规定，中国公使（驻日钦差大臣）于1877年（明治十年）12月上任。公使是何如璋、副使（知府）是张斯桂^⑥。而首任驻横滨领事（理事官）范锡明是在翌年，即1878年（明治十一年）1月抵达日本，并受到日方的正式接待。至此，旅居横滨的华人始同其它缔约国民一样，才享有治外法权。横滨华侨社会形成于1874年左右，这一判断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明治初年的十年，便可以说是它的成长、发展时期了。如图表所示，从明治十年到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为止，除个别年份略有变动外，华侨人口一直在增长着。这一点，可以认为是由于明治

① 见《横滨市史稿》，政治编3，1932年，第1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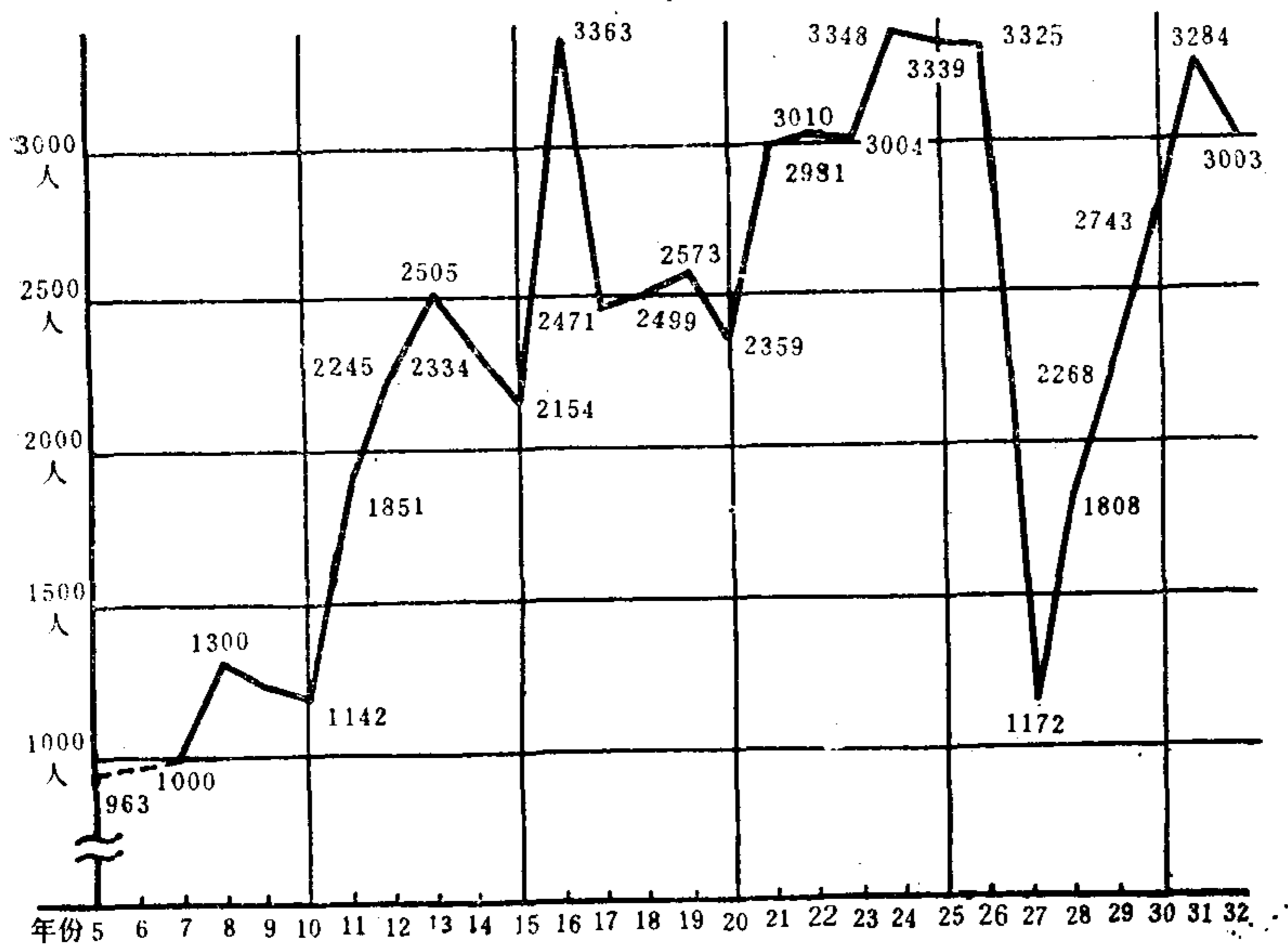
② 见前引内田书，第165页。

③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97页。

④ 同上，第885—886页。

⑤ 见《横滨市史稿》，风俗编，1932年，第577页。

⑥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89页。



侨居横滨的中国人数
(明治五年——三十二年) ①。

十年驻日公使赴任，继之翌年领事的到任，从而不再受日本政府法律约束的结果。事实上，从明治十年以后（即1877年——1886年间）不仅在人口增长方面，而且华侨社会的机能也在不断扩大，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如1878年（明治十一年），侨居横滨的华人，因山西省发生饥荒，曾集资约12000日元寄回本国，以为援助②。1885年（明治十八年）前，出生于广东、福建、三江的侨民分别成立了同乡会。这里，必须弄清侨居横滨华人的籍贯问题③。正如几个研究资料④所一致指出的：在横滨的华人，出生

① 此表根据《神奈川県史》资料编15近代、现代（五），1973年，第1057—1063页，以及《时事新报》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一日的的数据制成。
②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903页。
③ 同上，第889—890页。
④ 见前引《横滨市史稿》，产业编，第137页，前引内田书，第165页。

于广东者占优势，而在广东籍中，尤以广州府香山县出生者居多数^①，据此而联想到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孙中山亦属香山县人这一事实，将有重要意义。

在横滨华侨社会的发展时期，关于他们的职业状况，根据1887年（明治二十年）对华人在横滨开业情况的调查，可知其概貌。在总数149户中，经营杂货的（兼营点心、酒）25户、钱铺14户、鞋铺11户、饮食业10户、理发业7户、糖业5户、装订印刷业4户、药铺4户、当铺3户、裁缝3户、陶瓷漆器业3户，其它还有浴池、编织等行业^②。职业种类虽然繁多，但并不表明侨民在职业上可以自由选择，因为当局对他们在经营上是有种种限制的，如禁止到侨居地以外去经商，禁止在侨居地内从事烟、酒的制造等等^③。随着华侨人口的不断增长，犯罪率也相应增加，诸如赌博、卖淫、吸食鸦片，即是三种有代表性的犯罪活动。这些活动常是与日本人有牵连的^④。在鸦片问题上，华侨内部也曾有人试图加以制止^⑤。

如图所示，明治二十年代前半期，侨居横滨的华人已达3000人之多，但由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人口骤减三分之二，降低到明治十年以前的数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三分之一的中国侨民留在横滨，已不是临时离开本国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侨居地内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生活基础。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横滨华侨社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中日战争结束后，华人又开始增多，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4月，又成立了亲仁会这样一个社团。该会是侨居横滨华人中的广东籍商人，特别是属于上层人士的一个亲睦组织，其成员只限贸

①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64页。

② 同上，第907页。

③ 同上，第905—912页。

④ 同上，第891—894页。

⑤ 见《横滨贸易新报》，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易商、钱铺、饮食业主中的头面人物参加^①。亲仁会的成立表明，在横滨华侨社会中，大体已出现了上、下两个阶层，这种阶层的分化连华侨自己也意识到了。

第二年，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7月修改的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本文忆述的横滨华侨沿革亦到此为止。这是因为，由于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人同外国人开始杂居相处，华侨沿革有重新讨论与考证的必要。依据这种杂居状况来考察，华侨社会势将以一种新的方式维持与发展。在日华侨社会的这种变化，将待另文叙述。修改条约给侨居地内的华人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再次对他们在职业上的限制。具体言之，就是根据勅令与外务省令，阻止那些所谓不熟练劳动者入境^②。而这种禁令所产生的后果，内田直作氏指出，正是家族团体或秘密结社未能在日本华侨社会内部形成的原因^③。

三 横滨兴中会与中和堂

（一） 横滨兴中会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895年11月经香港、神户抵达横滨。在日本停留约两个月，在此期间横滨兴中会成立^④。参加该会的横滨华侨有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梁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余人。由冯镜如任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有发、黎炳垣等为干事。而后又有温芬（炳臣）、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文、黎简卿、陈植云、冯懋龙（自由）等相继参加^⑤。以后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几乎大部分革命活动都是以日本为直接舞台，

① 见内田直作：《东洋经济史研究》I，1970年，第82页。

② 见勅令第352号，内务省令第42号。

③ 见前引内田《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第171页。

④ 见《国父年谱》上册，1965年，第72—73页。

⑤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1965年，第4集，第15页。

或革命策源地而进行的。

横滨兴中会的创立，是革命派对华侨鼓动宣传的结果，还是由于华侨积极主动地支持了孙中山等革命派呢？如果是后者，即把推翻现存制度作为革命宗旨，那么，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而决定参加兴中会的呢？

考虑这个问题时，有两点重要事实须注意：第一，是孙中山与横滨华侨最初接触的经过。1895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以后，在回国途中轮船停泊横滨时，有一位横滨华侨陈清，在船上曾亲聆孙中山宣传反满救国言论，并将其所闻转告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等。冯等乃邀请孙中山登陆共商国事，未果，孙授陈以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等^①。第二，是加入横滨兴中会的华侨对该会活动持怎样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冯自由有如下的记述：

旅日华侨多视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故会员咸有戒心，每次开会通知书皆不欲假手于日本女仆，概由小会员冯懋龙分别派送。^②

从以上这两点可以看出，在革命派与横滨华侨接触过程中，从华侨方面来看是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性的。但是，他们参加兴中会实际上又是带有一定戒心的，因为他们认为参加革命是大逆不道的事。所以，概括地说，以冯镜如为首的一部分横滨华侨，由于不满中国当时的现状，产生了参加某种政治活动的要求，他们对孙中山等革命派所提出的排满主张，虽视为过激，但在想改变中国现状这一点上却相同。因而他们一面对这种过激主张怀着戒备心理，一面开始了与革命派的接触。这就是横滨兴中会成立的背景。

^①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4—15页。

^② 同上，第15页。

1895年兴中会在横滨创立时，17名会员的职业、籍贯分别整理为表 I ①。从职业看，商人占压倒多数。从籍贯看，则以南海县为最多，新会、香山两县次之。由此可见，南海县出生的商人，在总数17名会员中就有9名，占半数以上。这一事实表明，初创时期的横滨兴中会，可以说是以南海县出生的商人为核心而组成的。对比之下，南海县是9名，香山县只有2名。但在革命派核心人物中，孙中山的籍贯是香山，还有当时在日本的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并非出身南海。笔者认为，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横滨兴中会的活动是由华侨积极推动着的。而且，由于作为会长的南海县人冯镜如对同乡们的积极工作，兴中会才得以发展，而他也因此成为这一行动的中心人物。

职业 \ 出身地	南海	新会	香山	三水	职业别小计
商人	9	2	2	1	14
洋行职员	1	—	—	—	1
工人	1	—	—	—	1
学生	1	—	—	—	1
出身地别小计	12	2	2	1	17

表I 乙未(1895)年横滨兴中会会员的职业及出身地

如上所述，在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作为领导机关发挥作用的始于横滨兴中会，它经历了第二次惠州起义，以及和保皇派的对立与联合等多次曲折，直到同盟会的成立，才形成了一个大的革命高潮。在此过程中，兴中会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在横滨，而且整个兴中会组织，从它的性质、会员的成分上考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②，简言之，就是由初期以华侨商人和工人为核心，逐渐转向以所谓知识分子，最终导致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同

①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43—47页。

② 见手代木公助：《从戊戌到庚子革命派与变法派的交涉》，载《近代中国研究》七，1966年12月，第188—189页。

盟会的成立。应当着重指出，兴中会是在和留日学生的密切接触中，才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的^①。那么，在成分上，从商人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过程中，横滨兴中会初创时期那些商人的动态如何呢？具体地说，革命派之所以重视留学生，是否因为他们的出版物或宣传鼓动引起的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占多数的华侨商人逐渐脱离横滨兴中会的活动，革命派才使留学生走上革命运动的舞台。但是这里又有了新的问题，在会员成分上，从华侨商人向留学生的转变，是否那样天衣无缝、一帆风顺呢？这是个疑问。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商人要脱离革命运动，其原因何在？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搞清这些问题显然是必要的。

以上述问题为思考的前提，拙稿拟在下一节，阐述横滨华侨商人以外的人，即华侨工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二） 中和堂

在横滨华侨工人中，特别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是中和堂这个组织。这是一个船舶工人的俱乐部^②，开始并无名称，只不过是来往船员的息宿所^③。该所中供有关羽神象，每逢神诞及节日，船员均在此相聚饮宴^④，歌唱粤曲^⑤。其发起人为鲍唐，杨少佳、陈泽景、温炳臣、陈和等数十人^⑥，它是一个连名称都没有的，由广东工人集合起来亲睦相处的俱乐部。它与革命派取得联系是在1898年夏，兴中会会员尤列与其接触后，才开始定名为忠和堂^⑦。尤列建议订阅上海、香港的报纸，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但并未要求他们直接参加革命活动^⑧。（关于尤列，请

① 见野沢丰：《孙文》，1962年，第79—80页。

②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30页。

③ 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48年，第34页。

④ 见前引《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⑤ 见前引《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4页。

⑥ 见前引《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⑦ 见前引《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5页。

⑧ 同上，第35页。

参照后面补注。)

但是，同年冬，由于横滨华侨子弟学校——大同学校的董事改选问题，引起了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谓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对立。当时，反对保皇派的那批人，是以忠和堂这样一个团体的名义出现的。忠和堂会员温炳臣、陈和，推荐陈少白为该会顾问，这样，忠和堂与革命派便开始发生了关系^①。保皇派攻击忠和堂是迷信神权的下等社会。针对这一攻击，在陈少白的建议下，改忠和堂为中和堂，同时撤去关羽象^②。后来，基督教徒翟美徒等十余人加入中和堂^③，第二年，即1899年，翟美徒主持中和堂事务，1900年，尤列担任会长^④。

至于中和堂与革命派的关系，该堂自成立到民国初年，只是一个普通俱乐部，不过中和堂的办事人与革命党人接触频繁^⑤。堂内也有象温炳臣、陈和者加入了中兴会。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和堂随之消亡^⑥。

把以上过程简单地归纳如下。1896——1897年间，在横滨的唐人街，有个由广东籍船舶工人组成的俱乐部，1898年夏，革命党人尤列与其接触后，定会名为忠和堂，并严订了规章。同年冬，忠和堂采取了反对保皇派的行动，结果使中和堂出现了两种新的情况：一是聘请陈少白为顾问，与革命派建立了正式的关系；一是中和堂内撤去关羽象后，会员成分发生了变化，基督教徒参加进来。翟美徒、尤列先后担任会长，直到日本大地震消亡为止，该会始终作为工人团体而存在着。在此期间这个团体的干部与革命派常有接触，有些人则成为兴中会会员^⑦。

①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② 见前引《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5页。

③ 同上。

④ 同注①。

⑤ 见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1954年，第14页。

⑥ 同上。

⑦ 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载《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主编，1956年，第80页），与冯自由关于中和堂的记述有若干不同。